第一章忽喇喇　大厦方倾

1　“佐藤事件”真相曝光；日蒋单独媾和密谋直至胜利来临前中止，南京群奸倍感失望

飞机呈滑翔姿态，慢慢地出现在湿雾般的白云中；引擎轰鸣，声彻代代木机场的上空。

1945年3月16日黄昏，东京降落了一架来自上海的飞机。

飞机停稳，舱门开处，闪出一个大墨镜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神秘人物。矮胖的身材，光头，穿一身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腋下夹只公文皮包，急促地走下短短的舷梯，又匆匆钻进直接由首相府派来接客人的小轿车内。

有人认出此车乃小矶国昭总理大臣专用，不免要揣度来者头寸。慢慢地，消息灵通人士听到了一点传闻：这位化名“佐藤”的神秘客人，就是汪记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不过现在的真实身份，似乎是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政府的特使。一仆两主，够让人琢磨其中意味了；至于他偷偷摸摸跑到东京来，和小矶总理及东久迩亲王等人嘀嘀咕咕谈些什么，更是一团迷雾啦。

50年过去了，这团在日本称为“佐藤事件”，在中国称作“缪斌事件”的历史迷雾，至今尚未彻底澄清。更因为参与者皆已作故，或许永无水落石出的指望了。好在当事人生前曾向人披露点滴，在战后日本公布的官私档案及有关的回忆录中，也不乏零星记载，使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今天尚能描述其大致轮廓。

辨识蛛丝马迹的入手处，自然得从当事人缪斌开始。

缪斌，字丕成，1902 年生。其父缪建章是江苏无锡南门内希夷道院的老道，所以他有一个“小道士”的外号。

小道士不读《南华真经》，弱冠未久，即宣布服膺三民主义，跑到广州去投奔国民党。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他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助理处长。此后总司令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他恭随使唤，殷勤侍候，深得新娘欢心，就靠沾点裙带边，又干了一任江苏省民政厅长，鬻官卖缺，弄了不少油水，连当初极力主张儿子去皈依太上老君的缪老道，现在也啧啧称赞“革命”的好处了，并走出道观，搬进了缪斌用贪赃款在无锡新生路口筑成的花园洋房内。

岂知好运不长，在国民党派系倾轧中，小道士没拗过 CC 系的大腿，被撤去了官职。此后去美国留学镀金，还写了本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武德论》，表示对蒋委员长的崇拜。当时满洲事变早已发生，华北又跟着吃紧。秉承蒋介石意旨谋求妥协的何应钦，便唆使缪斌以在野身份，奔走于南京和东京之间，穿针引线，几回差使跑下来，便成了“日本通”。据说何应钦还要他拉拢石原莞尔等进行政变，试图使日本将矛头先指向苏联。缪接受任务后，即于 1936 年 2 月间赴东京活动，何应钦还派了个助手杨宣诚与其同行。未久，“二二六事变”发生了，结果是加强了军部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祸水也没引向苏联，而是全向中国奔腾扑来。翌年 7 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时，缪斌正在北平。国民党退得太快，快得小道士霎时中断了与何应钦的工作联系，更失去了对日抗战的信心，很快便下海做了汉奸。到 1940 年华北“前汉”和江南“后汉”正式合并，成立汪伪南京政府时，这个在蒋介石手下官至简任便滞步的厅长，一下子就做成了立法院副院长的选任大官。但是他在汪伪集团中，并不得志，位高，权[illegible]，差闲，除每月去南京出席两次所谓立法院常会外，时常留居在上海绍兴路 86 号住宅里。据其于抗战胜利后告

诉别人，原来他早在 1939 年‘七七事变’两周年时,就已经和何应钦联系上了,办法是派其亲信游翰明身携一幅《苏武牧羊图》,秘密进入重庆，面呈何应钦。那图上，有小道士亲笔题诗：

只身羁漠北，大节炳匈奴。生死置度外，苦志行若愚。几历酸辛事，渐审道不孤。逾云怀故旧，何日得昭苏。群羊绕我旁，畴分汉与胡。彤云郁未舒，壮士辄长吁。

眼皮一眨，屈身事敌的汉奸成了大节彪炳的忠臣。唯恐党国不信,缪斌又通过关系,把两个儿子秘密送到重庆去充当‘人质’。此后,再请杨传伯代向重庆沟通,还写了效忠信。就这样,缪斌成了国民党军委会调统局(即‘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由局长戴笠直接指挥,代号‘王佐’,取《说岳全传》中‘王佐断臂’之义。到了 1943 年初，“王佐”暗通重庆军统的秘密，被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侦破，旋报日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加以逮捕。岂知马上就有日本在华东的最高情报机关负责人代为说情,向‘派遣总司’证明,缪与重庆军统的关系,是经过他许可的。至此,汪精卫才恍然大悟,这位矮冬瓜似的小道士,不仅是身历‘两汉’的双料汉奸,还是个勾挂蒋日的两面间谍，不由自叹弗如。不过再让这块歪料坐在立法院里，他有点不放心，于是另调任考试院副院长。考试院系旧武庙改建成，殿宇巍峨,仍像一座庙堂。院长江亢虎信佛,人称‘大头居士’,小道士当他副座，僧道合壁，共处一庙，一时传为笑谈。

笑谈归笑谈，小道士办大事的机会还真的来了。1944 年冬天，日本诱蒋介石的最大障碍——南京伪国府主席汪精卫死了。紧接着，苏军强渡奥得河进入波兰，西线盟军已从法国攻进德国，美军在进攻马尼拉的同时，已在加紧血战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准备。眼看德国同伙覆灭在即，日本亦将不支，刚接替东条英机组阁的日本新首相小矶国昭决定加快诱蒋单独媾和的步伐，以期从中国战场的泥沼里拔出腿来，集中力量对付英美。此议得到了以东久迩稔彦亲

王为首的一部分皇族亲贵的附合，遂形成所谓《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方案》,其要点为：

由中国方面促使在华美英军队自动撤退。如美英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有关实行方法，应根据停战协定。

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宁渝两个政权之间的调整是中国内政，由双方直接谈判。

废除日本与汪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实现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以中日永久和平为准则的友好条约。此后对中国内政问题一概不予干涉。

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蒙疆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香港让交中国。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保障要求”,应尽可能满足

该方案经日本最高军事会议原则通过后，重光葵外相等人主张由汪精卫的继承人陈公博或周佛海等南京奸伪大员进行。但小矶国昭则以为绕过这些人更合适些，结果选中了在伪考试院蹲冷庙的小道士来充当这笔秘密政治交易的掮客。

1945 年 1 月，小矶国昭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山县初男大佐，由东京飞到上海密访缪斌。缪斌大喜过望，马上通过戴笠秘密联络,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事实上,从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从未停止过与日本妥协的暗中洽谈。此时‘史迪威事件’余波未息,美蒋芥蒂犹在。为香港归属问题，蒋介石曾与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争过一场，同样是耿耿于怀。所以收到戴笠转呈“王佐同志”的密报后，相当重视。即另拟媾和条件为：

1. 取消伪南京政府和伪满洲国，另立南京“留守府”；

2. 在南京“留守府”取代两个伪政权后，重庆政府方与日本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

3. 停战协议正式发表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4. 承认日本在华享有经济上的特殊利益。

以上条款，即为中日全面和平腹案，可由缪斌径赴东京交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戴笠，向小道士提出严重警告，此行绝不容许泄露半点风声，因为在 1943 年冬天的开罗会议上，蒋委员长已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了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而且保证过谁也不允许背着盟国，单独与日本媾和。这就是‘王佐同志’又变成了‘佐藤君”,而且还要架上一副大墨镜的缘故。据知情者说，小道士受命之后，还怕那位反复无常的蒋委员长将来不认帐，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又通过戴笠向蒋介石求得过一纸全权代表的派令，这才放胆东行。

甫降东京‘‘佐藤’即被迎进了国宾馆,享受岛国招待外国元首特使才给予的隆重待遇，好不风光。当天晚上，一场日蒋单独媾和的秘密谈判开场了,其间‘佐藤’用规定密码,数次向重庆汇报密洽经过并请示机宜，甚至连号称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都被瞒过了。国与国的关系，有时也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似。就在“佐藤”降落东京代代木机场前不久，罗斯福刚在雅尔塔会议上瞒着蒋介石达成了以牺牲中国权益为代价的秘密协议，如今蒋介石又瞒过美国佬同日本谋求单独媾和，恰似一报还一报。

然而这一报终究没还成。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军方的强硬态度，认为蒋介石要价太高。在 3 月 21 日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小矶首相拿出他和东久迩的意见，以为可以由中日双方再各自作出些让步，求得单独媾和的实现，而彬山陆相、米内海相和梅津总参谋长则强烈反对，同时重光葵外相也指责小矶的“佐藤工作”是无视外务省的存在。由此事为导火线，引出了政府究竟是否国家最高机关性质的争辩，即倒底是内阁指导内政外交，还是大本营控制内阁 争吵一直闹到‘上达天听”。在此过程中,一心想干成这件惊人之举的缪斌,忍受着美军不停空袭东京的威胁,老在等待着。结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皇的“圣裁”是首相列席大本营，而非小矶所希望的将统帅机关置于战时内阁之下。于是，所谓‘佐藤工作’的失败，便成了 4 月 5 日小矶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随之成立的铃木内阁拒绝接受缪斌带来的重庆方案。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和太平洋战局前景的日趋明朗，蒋介石对是否有抢先媾和的必要，又犹豫起来，遂指示‘王佐同志”尽快返回中国，以免夜长梦多，日长事多。

“中日全面和平”虽然没有实现，但缪斌还是以此行为荣的。因为这是受蒋委员长的大命，非等闲之辈所能领受，何况还造成一个内阁的垮台哩！此外，据他所知，四年之前，即 1941 年 5 月，第三帝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也曾肩负着秘密媾和的使命飞往英国，不过等他的飞机一降落在苏格兰的一片草地上，他的自由生活便宣告结束了。比较起来，自己这位东方的赫斯还能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也算是大幸了吧。

得意之际，免不了向自认为牢靠的人吹嘘几句。渐渐地，金陵城内颇有一些同为汉奸者领略了些许天机。嫉羡小道士居然有“蒋委员长特使”的殊荣身份之余，又同抱遗憾：假如这一次单独媾和实现，则南京“留守府”便名正言顺地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个分支，不但人人头上一顶奸伪帽子可自动摘去，而且蒋委员长“还都”之际，或许还要‘维持’有功的勋员哩。现在呢？唉！

伪考试院长江亢虎过去爱端个大居士的架子，不太瞧得起小道士，如今则着意巴结‘地下工作人员”，恐惧日后难逃委员长惩罚的心情，溢于言表：“丕成兄，你可是上了保险罗！兄弟看穿了，汪主席也好，蒋主席也好，谁不搞和平运动？只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躲在重庆偷偷摸摸地搞，就是抗战领袖。我们跟着汪主席来南京堂堂正正地搞，就算是民族败类！嗨！兄弟也腻了，打算出家做和尚去……”说着，把个硕大出奇的脑袋直摇。

“不忙，不忙。”缪斌半是自矜，半是安慰：“日本人在冲绳的防守相当坚固，美国人讨不着便宜。豫西会战，刘峙这家伙又丢了南阳、襄樊，还有老河口。这场战争一两年内结束不了。江院长你等

着吧,迟早还会有和平的机会。”

“对,对!”江亢虎似有同感,原说是要清静的六根,又混沌了起来。

只要重庆与日本单独媾和实现,大家都有“希望”——整个1945年春夏,汪伪政权的衮衮诸公中,不少人都与江亢虎一样,做此期盼。

果然,就在缪斌使命失败后不久,由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伪参谋次长杨振中兄弟俩居中牵线,又有来自第10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使悄悄潜入南京,在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的秘密会晤中,非正式地提出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和平原则”,要点是侵华日军立即从华北、华中和华南撤出,作为中日停战的先决条件,然后再根据中日停战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兵。至于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行动,中国概不妨害。

显而易见,凭藉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及整个太平洋战局形势骤转的优势,惯能看风色做生意的蒋介石,又抬高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开价。鉴于‘佐藤工作’最终被大本营否定的教训,今井武夫及其上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均不敢贸然从事,马上向东京方面请示。经铃木首相和陆相、海相、外相获得一致意见,才决定由陆相阿南负责,在中国大陆由冈村宁次负责,主持对华媾和谈判。条件如旧,同时提出‘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

正是这最后一条,似乎又给已面临绝望的汪伪汉奸们,制造出了几朵玫瑰色的云彩。

再经过数次联系后“派遣总司”和第10战区长官部确定以6月中旬为最后洽商会谈的日期。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充当掮客者在往返豫皖与南京的路程中,又多耽搁了半个多月时间。

半个多月时间里,美军已攻克冲绳岛,转向登陆日本本土战;协调盟国共同对日作战的波茨坦会议,已在筹备。内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牵制,外有盟国胜券在握的绝对

优势可依，蒋介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同日本讨价还价，谋求单独媾和了。

7 月 9 日，当日本“派遣总司”代表今井武夫少将一行冒着中美空军混合编队频繁轰炸，终算赶到一个多月前中国第 10 战区长官部指定的会谈地点——河南省周口镇南边的新站集时，得到的答复是，中日单独媾和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正式发表。铃木首相声称“不屑一顾”，宣布日本将把战争进行到底。而长期参预诱降蒋介石活动，甚至前不久还觉得小矶内阁在“佐藤工作”，中对蒋介石“让步”太多的今井武夫，则重新认识到了历史车轮飞速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作为日本侵华军方高级特工的今井武夫之流，此刻正更多地是在为太阳帝国之未来命运而深深担忧的话，那么，在“大头居士”江亢虎之类得知日蒋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已彻底失去后，则如五雷击顶，完全坠入了替个人命运悲哀的无限惶恐中。

自然，也有略觉忐忑，但终究能自我安慰的人。缪斌就是其中一个，现在他已从“地下工作人员”转为“地上工作人员”，连那部经日本“派遣总司”默许而重新使用的无线电台，亦成了公开的秘密。倘若不是受到日军特工部门使用电波探测机对之实行严密监视的话，也许想求他利用密码抓紧向重庆表示效忠的“和平运动”分子，可以成排成连地统计吧！不过真是这样的话，“王佐同志”也会推托没空。现在，他正抓紧时间搜集材料，要写一部争取一鸣惊人的大著——《我的对日工作》。几个月前秘访东京时和东久迩亲王在国宾馆内的合影，由须方国务相及山县大佐等人陪同观赏樱花的摄相，现在也翻出来制版了，准备附印在书内，作为“东方的赫斯”传奇般之经历的佐证。

8 月 9 日夜晚，缪斌手提一只装满“材料”的皮革箱，最后一次跨进南京伪考试院的大门，向院长江亢虎请假。“大头居士”正神色紧张地同几个和尚在交谈着什么，听缪斌说明来意后，惨然地苦笑

道：“走吧。你不会有销假之期了，我这个院长，也当不了几天了……”

“吉人自有天相,院长摄自珍重。”缪斌躬了躬肥胖的身躯,与江亢虎作别。江怔怔地望着小道士的背影消失在曲槛回栏的拐弯处,感慨万端。寂静中,从座落在考试院西侧的鸡鸣寺那边,悠悠扬扬，飘来了晚钟敲响的声音。这位当年大倡“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以诱骗青年女信徒为极大乐事的‘中国社会党”党魁，突然大彻大悟：

“千里搭长棚，天下本无不散的筵席啊！”

2 日本天皇颁诏投降后一周内，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相继解散

江亢虎的顿悟来得太迟了。缪斌乘沪宁夜车跑回上海的第二天,即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分别向参加《波茨坦公告》的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唯一的附加要求是“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至于此前曾在与重庆洽商单独媾和时三复斯言的“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云云,只字未提。

帝国崩溃在即，自救尚且无暇，还顾得上什么对傀儡政权的“道义”?乞降照会一经新闻媒介传播,奸伪大哗,纷纷咒骂小鬼子不是玩意儿。半是詈人半是自挽的噪音，混杂在沦陷区百姓欣闻鬼子末日来到的欢呼声里，虽说很不协调，但汉奸骂鬼子，也不乏几分滑稽的意味。

没想到，还有比之更辛辣的讽刺剧要他们上演。

8 月 15 日，所有在华的日本侵略者拜聆过天皇的投降诏命后,立饬各伪政权‘自动解散”,本来是自欺欺人藉此销毁扶植傀儡统治中国之罪行的一部分，却又从更悲哀的角度，为主子奴才

“共存共荣”画了一个阿Q式的“押脚”。

“押脚”的还原性描绘,得从追述“起首”开始。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起算,各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和巨奸祸首,大抵可分成帝制余孽、北洋官僚和国民党失意政客、军人凡三大门派而前后最称臭名昭著的招牌,其有六块。

始作俑者,是1932年3月在长春搭班的“大同”政府,以逊清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两年后,即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黄袍加身,称“皇帝”,年号“康德”。

儿皇帝登基一年多后,1935年11月,又有了在通州炮制出笼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系老牌日本间谍殷汝耕。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民党丢师弃甲扔掉华北后,北平冒出来一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暂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是王克敏,时为1937年12月。翌年3月,沦陷后的南京又有一个恰与北平汉奸政权相对应的“维新政府”产生,“行政院长”是梁鸿志。时人谑称“临时政府”为“北汉(奸)”,“维新政府”为“南汉(奸)”。

到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出演南汉北汉合流,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样,“南汉”和“北汉”又被统称作“前汉”,汪伪国民政府则称“后汉”。不过原先的“北汉”(即华北临时政府)那班人马,视日本侵略者如考妣,对“后来居上”的汪精卫却不大买帐。自并入“后汉”后,实际上不听汪伪国民政府的号令,另有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在做他们的太上皇。

除此之外,张家口还有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9年9月开张,前身是辖有“内蒙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及“察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的“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翻牌后,三个伪政权改称“政厅”。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主席”,是清朝时注册世袭的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

前汉后汉,伪满伪蒙“国号”纷纭,旗式也分五色、七条、青天

白日拖个猪尾巴等种种式样，恰能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割统治中国的险恶用心。当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一概都由“皇军”安排，或秉其意旨行事。现在，又到‘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时刻了。

套用‘大头居士’江亢虎的顿悟之言，现存伪政权中，开筵最迟的是汪记南京国民政府，但散席最早。

时为 8 月 16 日下午，天皇广播《停战诏书》的第二天，地点是南京‘新市区’颐和路上的‘主席官邸。”

这所公馆是在“大东亚圣战”走向衰落的年代里建造的，因为物资匮乏，所以不能说是很宏伟 但拥有宽 敞的庭院，特别是它的来历，颇值一叙。

原来五年多前汪精卫主演 国民政府“还都 南京闹剧时，本欲将原先就是国民党政府机关集中地 的国府路国民政府（今南京长江路 292 号）大礼堂当舞台派用处的。只是这幢建筑已于 1938 年春天被伪维新政府占用。如今‘前汉’并入“后没”，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只分到伪监察院院长一席心 怀不满，便拒 绝让出房子来，道是他的监察院机关就设在这里，不挪窝了。

汪精卫大怒。他倒不是看中这幢国府大院的风水，只是不回到这里‘还都”，便显示不出汪记国民政府的‘正统’来。偏偏日本人并不想让他‘正统”，在这场房子官司中，明显袒护梁鸿志，以至伪府“还都”大典的日期，一再拖延。最后，汪精卫只好自认吃瘪，将伪府成立典礼改在鸡鸣寺东侧原考试院住址里举行，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关帝庙堂内。此后，伪府行政院就挤在这里办公。汪精卫常站在庙堂的阶石上，远望紫金山头白云缭绕，耳听鸡鸣寺里暮鼓晨钟，还哼出了几句‘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可是伪廷“慈禧”——汪夫人陈璧君没有丈夫这等住庙吟诗的雅兴，特别是常有一些和尚来找江亢虎谈机锋，悟禅学，更叫她见了光头喊晦气，旋决意另造一幢‘主席官邸。’等到房子快竣工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汪精卫病倒了，被送赴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治疗，此后就死在岛国。这样，继汪精卫之后出任伪国府代主席的陈公博，便顺理成章地搬进了这幢汪精卫无缘享用一天的“主席官邸”。

乔迁之日，“陈代主席”的“第一夫人”李励庄和“第一情妇”莫国康都欢喜得合不拢嘴。一个忙着装饰“东宫”，一个要紧打扮“西宫”。爱嗅木犀香的莫国康，还特地吩咐人去植物园里挖出几株金桂，移栽到卧室的窗下。孰知金桂开花的季节尚未来到，“主席官邸”的末日倒先来了。

这会儿，官邸主人陈公博正站在大会议室的落地窗前，一枝接一枝地抽着香烟，等待出席会议的大员们的到来。树木浓荫中，一声声夏蝉鸣叫，使他烦闷的心情更添几分躁意。

陈公博，1892 年生于广州。辛亥革命后投身同盟会，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但不久便与中共脱离关系，赴美留学。回国后，在广东大学当教授，又被大革命洪流卷进了政界，从此成为汪精卫手下最得力的干部。最得志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铁道部长等职。汪精卫出逃重庆投敌前，他没参与过卖国决策，但随后也逃离大后方去香港。经过一段时间观望与犹豫后，最终彻底失去对抗战到底的信心，公开参与汪氏集团的汉奸活动，人称“半途下水”，乃成伪府中第 2 号人物，历任伪立法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俟汪精卫死后，再一跃为伪国府主席，伪行政院长及伪军委会委员长、伪中央执委会代理主席等，做成汉奸中的头牌。在其身穿吉服，于汪精卫棺材前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曾红着眼睛高喊要继续汪先生的既定政策，全力协同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

周岁未满，言犹在耳。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大东亚战争完蛋了，还要抢在签署降书之前，先把“全力协同”者送到棺材里去。天皇颁诏后，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派遣军总司令部今井武夫等人，先后来官邸作正式通知，“奉劝”陈公博及早解散“和平政府”，不致成为他们和重庆讲斤头的障碍。做汉奸者会有如此结局，陈公博倒

并非完全没有预料，从今年春天轴心国败象大昭以来，他就想方设法往重庆作秘密靠拢，竭尽献媚，为的就是留条后路，万一太阳帝国这条破船说沉就沉的话，还可以搭蒋介石那条中华民国的船。岂知自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委命，汪伪阵营中好多军政巨奸都被封上了什么先遣军司令的新职务，就连伪府第 2 号人物周佛海也有个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的头衔，唯有自己，始终未得任命。情知自己这张热面孔已无贴紧蒋介石冷屁股的指望了，陈公博乃决意抓住日本人当救命稻草，马上向谷正之和今井武夫等表示遵命。

恭恭敬敬送走日本人后，陈立刻与正在上海的周佛海通了长途电话,要他即乘飞机来南京,共商结束伪府的事。果然,已经投靠上蒋介石的周佛海，对此不感兴趣了，说是正忙着指挥行动总队布置防止新四军攻占上海的军事措施，南京方面的事，由“公博兄看着办”。陈公博又酸又气,和周在电话里大吵一场,最后威胁说,及早解散伪府是日本人的命令，倘因老兄故意拖延引起他们打消履行投降条件的诚意，在上海来个大破坏，只怕你这个总司令也无法向蒋介石交代吧？

这一招果然灵验。周佛海立刻答应，明天一早准定回南京出席“结束会议”,但有关‘善后’方法,仍祈公博兄先拿出计划来。

下午 4 点过后，出席“收场大典”的人纷纷来到。由陈公博的“官邸派’亲信、伪府秘书长周隆庠等人伫门恭迎,一个个请进大会议室内。时当酷暑,南京更有‘火炉’之称,但屋内气氛可比寒冬,人人脸上挂霜，心境冰凉。其中尤数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内政部长等要职的陈群为最。此人与梁鸿志系福建同乡，又共创维新政府成为“同奸”。放在往常,这两个人只要一碰头,就会操一口闽南方言,从做诗文到嫖女人,吹个没完。今天不对劲,梁鸿志进门后,见他已经在座,唤了声‘人鹤’(陈群表字人鹤)算打招呼,他竟怔怔地盯住对方,仿佛面对陌生人。梁当他中暑昏迷了,忙厉喝一声其乳名‘荣福!’倒把其它人吓了一跳。再瞧陈群反应时,低垂的厚眼皮下,竟

滚出了两颗泪珠。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各人都学陈群,不作搭讪。颇显特殊的，一个是姗姗来迟的周佛海，风度依然潇洒，一副金丝眼镜片后，掩饰不了他比谁都要舒展些的神情；另一个是陈公博，也还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的老样子。座中有人暗自赞叹,果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大难临头,就数“主席”沉得住气！

最后一次‘国府会议’开始了。常川在宁的部长以上的大员,除小道士缪斌不屑再与侨辈为伍外，全部出席。这在汪伪政权成立以来,倒是难得的。有些像不少相知故交们,平时各奔衣食,总想聚一聚，却总是抽不出时间等到谁的讣闻传来了，那就非得去作一次永别 朋旧到齐的场合,往往是在大殓之际,就是这个道理。而今一起来给伪国民政府送葬，亦是循此人之常情吧？

会议议程相当简单，陈公博传达日本人有关“和平政府”自行解散的‘建议’;无人提出异议。梅思平把预先写好的解散宣言拿出来当场宣读,一致通过。接着,陈公博作简短讲话,要求各伪机关照常上班,负责结束,静待重庆来人后办理移交。至于伪府既告解散,而又‘照常上班’的机关算是什么性质,宣言里已写明白了。即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继续行使业已入土为安的伪府各项职能 ;伪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率所辖各部伪军‘守土安民’。

或许是嫉妒周佛海那副潇洒相吧,陈公博讲完‘结束’要点后,又有意无意地‘透露’了几点掺合着恫吓的‘传闻’:

1. 冈村司令官说共产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

2. 已听说有人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去投新四军。

3. 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

周佛海面色大变，忙建议散会。

从 1940 年 3 月 20 日开场,到 1945 年 8 月 16 日拆台,总计南京汪伪政权存在时间不及五年半。

曲终人散，陈公博驱车去大方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太上皇冈村宁次汇报解散伪府经过。晚 8 时，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发这篇由陈公博拟稿的“解散宣言”。

奇文共欣赏，而且不少有关陈逆的档案汇编里没有收进这篇东西,兹予摘录：

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在汪先生领导之下，还都南京。当日宣言，以实现和平、实施现政两大方针昭告海内；原其要义，于国家残破之余，以和平求国家之独立自由，以宪政求国家之建设复兴。还都以来，一切行政设施，在全面和平实现之前，务求保全国家之元气，抚辑流亡之人民，努力六年，未曾少懈。终以事态扞格，全面和平未能实现而宪政亦未克实施，每复兴念，辄增罪责。今则世界已回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虽和平之方式与当日所致力者不同，而国家之独立自由要与全国人民所希望者，曾无异致。同人认为今日国家亟应复归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以符夙年蕲求统一之始愿……

汉奸逻辑派生出来卖国有功论，固然不值一驳。不过对照起“满洲国”的收场,陈公博尚有自己给自己写悼词的“权利”,以求和汪精卫执笔的“还都宣言”前后呼应,显示“有始有终”,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也。

昔日粉墨登场,风光一时的“满洲国皇帝”,今日如何下台？

8 月 9 日上午，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酣睡中的溥仪吵醒了。当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大清宣统皇帝时,只要公鸡一啼,老太

监就来招呼皇上起床，还铮铮有词地背诵高宗纯皇帝乾隆爷的圣训“黎明即起，万机待理 勤政爱民，事必躬亲…… ”唠唠叨叨中，小溥仪睡眼惺松，哈欠连连，身不由己地被小太监们拖出被窝，换上龙袍，去参加朝会。如今老太监已死，除了那个关东军派来监视他的‘御用挂’吉冈安直外，谁也不敢来掀‘皇上’的热被子了，更何况这‘皇帝’做得形同木偶，既无‘万机待理”，也就没必要‘黎明即起”了。于是溥仪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已成规矩。

谁敢在这个时候来惊扰“皇上”？溥仪气呼呼起抓起了床头的电话听筒，准备给对方几句‘圣训”。

一接话“圣训”咽进了肚子里。电话是关东军司令部打来的，道是苏军入侵满洲国，山田司令官即将进宫向陛下通报前线战况，让陛下作好准备。

作好准备，就是命令儿皇帝恭候太上皇驾到的同义语。溥仪不敢怠慢，马上起床漱洗。用完‘御膳”，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领着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和吉冈安直来了。根据‘皇上’的吩咐，会见地点在同德殿。

山田乙三是个矮瘦的小老头，平时举止沉稳，说话慢条斯理。现在像换了一个人，急促地向溥仪说着，皇军如何早有准备，如何具有必胜之信心；那越说越快的话音，十足证明连司令官自己也没有十足的准备和信心。话还没说完，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苏军是凌晨进攻的，这会儿已将炸弹扔进了‘新京”（即长春）！溥仪马上庆幸在同德殿‘召见’是一种先见之明，因为防空洞就在殿外。皇上和总司令、参谋长等人躲进防空洞内。进去不久，不远处传来了爆炸声。溥仪暗诵佛号，山田大将默不作声。一直到警报解除，分手为止，山田再没提到什么信心问题了。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将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告诉溥仪必须当天动身。溥仪想到财产和家人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再三哀求，总算给了三天宽限。

三天后，捧着天照大神的‘神器”，溥仪随吉冈安直等人登上了

开往通化大栗子沟的火车。火车走了三夜两天，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情景之狼狈，不亚于皇上的奶奶慈禧太后当初出逃西安。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旭日东升,驱散群山迷雾,青山翠谷,景色极美。不过,这一切在蒙难中的‘皇上’看来,却都是灰暗的。

在一个日本矿长的住宅里度过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后，溥仪接到了吉冈安直的口头通知：天皇陛下已颁停战诏书，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和吉冈一块儿向苍天磕头，感谢上天保佑！天皇平安！心里却又犯嘀咕，我这个陛下，又靠谁保佑呢？

没有人向溥仪作出许诺，但总揽伪满朝政大权的“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却于 8 月 18 日那天,导演了一场‘康德退位’的‘悲剧”。对比两天前在南京发布伪府解散宣言的陈公博,儿皇帝的更堪怜处，是这份“退位诏书”亦得由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来写,他的任务,只是在闹哄哄的矿长住宅里,手捧脚本对着一群丧家犬似的‘大臣”“参议’们念上一遍——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本来，在这份伪满洲国的悼词里，还有“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等一而贯之的谀词，反倒是被在伪满宫廷里守护大神的祭祀长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难道把“大满洲帝国”送到坟墓里去，还要靠大神的灵光？

从 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成立以来,不到 11 年半的时间里，溥仪一共念过 6 种诏书,即《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退位诏书》。按伪满时代的规矩，无论学校、机关或军队，每逢颁布一种诏书的‘纪念日”,称‘奉诏日”,都得集会宣读这个诏书。唯有这个《退位诏书》，再无指望让“顺民”们恭聆拜诵了。

满洲国完蛋了！“康德皇帝”也完蛋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